



纪念孙犁先生

莫言

孙犁先生创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创刊3000期，真是可敬可贺！作为报纸副刊，能够持续出满3000期，在中国的报刊史上，应该都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吧！这与孙犁先生一生秉持的严谨、认真的作风密不可分，也与该报贴近生活、注重文学性的办报风格有关。

我与孙犁先生素无交往，但童年时就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反复阅读过他的《荷花淀》与《芦花荡》，受益良多。后来又从小学老师那里，借读了他的《铁木前传》与《风云初记》，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位大作家的印象。

1979年，我调到保定山区的部队工作，业余时间学习文学创作，与保定文坛建立了密切联系，详细了解并亲身感受到了孙犁先生开创的“荷花淀派”，以及他本人在保定文坛巨大的影响。我从保定文坛的每一位老师那里，都听说过孙犁先生的故事，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仰与日俱增，也暗下决心要以先生为楷模，努力地向着“荷花淀派”靠近，争取能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为此，我还跟《莲池》编辑部的毛兆晃老师去白洋淀体验过生活。在我早期的小说里，据说也能看出“荷花淀派”的影响。当然，我也能见到孙犁先生亲聆教

诲的梦想，编辑部的老师也鼓励我将自己的小说寄给先生求教，但我终因胆怯而未敢贸然打扰。

1984年初春，我在《莲池》编辑部改稿，翻阅办公室报夹上的《天津日报》时，猛然发现孙犁先生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评论》版上的《读小说札记》，首段就写道：“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作的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些文字，但依然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

孙犁先生的这段评价，对我后来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拍板决定录取我的徐怀中先生也是河北人，他非常喜欢孙犁先生的小说，对孙犁先生的人格也有着极高的评价。我觉得徐怀中先生的小说里，也有“荷花淀派”的美学风格。

入学后，给我们讲文艺理论课的冉淮舟老师是孙犁研究专家。他浓郁的保定口音让我倍感亲切，我在保定文坛的那些老师，都是他的朋友。

去年5月初，我重返白洋淀，参观了坐落在嘎子村里的“徐光耀文学馆”和“孙犁致徐光耀手书陈列室”，见到了很多朋友的照片与孙犁先生的大量墨迹，回忆起很多往昔的生活画面。当然，感受最深的，依然是孙犁先生在保定这片文学沃土上乃至中国文坛上持续不断的影响。

2024年9月6日

致「文艺周刊」

贾平凹

在我年轻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写作，就知道《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那里有文学大师孙犁，那里是培养文学新人的阵地。我给“文艺周刊”投过稿，后来也去拜访过孙犁，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大作家办小栏目，小栏目又扶植了那么多的作家。七十年来，这个周刊一直在，一代一代编辑在秉承着传统，高举着文艺大旗，坚守着文艺的观念，它是中国文坛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是一个光辉的典型。在它创刊3000期之际，我深深怀念孙犁先生，并向周刊和办周刊的编辑们致敬，衷心祝“文艺周刊”文运永续，越办越好。

2024年9月5日

一种缘分

——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一封信

编辑同志：

我和《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是有缘的。1951年初，从农村插班考入省城保定一中，在学校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文艺周刊”，正在连载孙犁同志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非常喜欢。从此，我开始爱好文学，练习写作，向“文艺周刊”投稿。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期间，撰写《论孙犁的文学道路》一书，结识孙犁同志。

1961年到《新港》编辑部工作后，我和孙犁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彩云》，就是请他审核清样，《论孙犁的文学道路》也是在他的指导下修改、出版的。我也为孙犁同志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搜集、整理佚文；收藏、保存手稿、信件；编辑、出版《津门小集》《白洋淀之曲》《文学短论》《文艺学习》《风云初记》《孙犁文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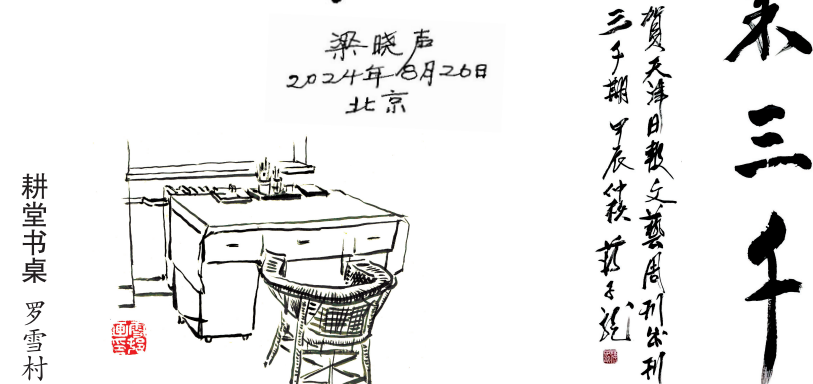
交往中，我们相互写了很多信，保存下来的有二百四十九封。孙犁同志写给我的一百二十九封，结集为《幸存的信件》（给淮舟的信），他写了序言；我写给孙犁同志的一百二十封，结集为《津门书简》，他写了题记，都出版了。

为了纪念孙犁同志，从去年2月开始，写作《关于孙犁作品的通信》，把我七十多年来的阅读心得体会，所知相关史料和逸闻趣事都写进去，已写了一百多封，长的几千字，短的几百字，平均一千多字。写起来自然随意，自我感觉还好，有些内容，也有些新意，顺利的话，明年能完成，三四百封信、四五千字。这是我晚年还能做的一件事情，当尽心尽力，争取做得好一些。

知悉“文艺周刊”出版3000期，惊喜祝贺，给你们写了这样一封信。即祝秋安！

冉淮舟
2024年9月16日

三千文编今回看，一片冰心在玉壶。



“3000”不是一个小数字，惊愕的同时也感慨：时光过得真快，竟然有这样多的数字叠加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自1949年创刊，已经七十五年了。每周四的“文艺周刊”版，是多少人念念不忘的期待啊！那时家里的亲戚在水利工地上班，会收集很多周四的报纸给我。那种贪婪的阅读，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我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孙犁先生还健在，他看过我的小说，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有一次参加颁奖活动，我恰好坐在她身边，但我从没见过那些勇敢的业余作者那样，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请孙犁先生指点一二。所以，我一直没机会见到他。虽然他创办的这块文学原创园地，我是受惠最多的作者之一。有段时间，我经常去想，怎么就没有去见孙犁先生一面呢？到外边开会，经常会有人问起这个话题。我想，好像骨子里似乎从没这种意识。乡下的孩子，能够骑车到县城，已经是很大的眼界了。感觉中，他像山一样巍峨，我就像山脚下的一只小小蚂蚁，无论怎样攀爬，自觉都无缘见到他。对，我当年就是这样的感觉。自觉渺小，就只能遥遥仰望。

「3000期」感怀

尹学芸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那时擅长写短篇，万字以内。写完后，哪个字按着哪个字都记得很清楚。1989年发表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拿了当年的飞天奖银奖。这在当年，是个了不起的成绩。《天津日报》每周拿出一个整版刊发文学作品，而且一发就是几十年，外边的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从没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这不理所当然吗？因为我从没留意别家报纸都有什么版面，不知道很多报纸是不设文学专版的。我就像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从不关心视线以外的内容。那个时候的“文艺周刊”，成就了多少人的梦想啊！那样一块大版，能发八九千字，讲故事的愿望，总是很蓬勃。周五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议论你的小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以及村镇的领导全都看得见，真是令人鼓舞的事情。像全民阅读这样的事，根本不用倡导，只要心里有愿望，都是自主行为。有一次我回村里，正碰上几个村干部读小说，一个人读，三个人听。我在窗外听了会儿，悄然离开了。他们读的小说叫《乌云岭的女孩》，写一个乡下女孩进城的故事。就听一个人说，这个女孩不是她自己？因为有这样的阅读氛围，创作就变成了特别有劲头的一件事。有一次发表小说《燕春苗》，是写三年困难时期野菜与人物命运的关联故事，触动了很多人的情感记忆。当时党校有一个县委书记培训班，一个领导打来电话，谈他自己的感受，也谈班里讨论时的情况，让我很受鼓舞。

当然，也有“走麦城”。一个小说的主人公被人对了号，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因为写小说当被告，是个新奇的事。也因为这篇小说发表在报纸上，阅读广泛。如果发表在刊物上，一般读者很少看到。有趣的是，我当时用文字帮助别人赢了官司。记得我当时对法官说，老百姓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说明社会进步了。生活总是制造种种作料，时过境迁，都成了人生阅历和经历的一种。

我还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拿过多种奖项。《两朵花》拿了播主奖，记得当时奖金不菲，很长时间都被人当作话题。《一方水土》拿了“纪念5.23讲话”一等奖。《燕春苗》拿了“新生代”征文一等奖。《千古》拿了“引滦入津”征文二等奖，还有一些想不起名字的奖项，得到过保暖帽、不粘锅、矿泉壶等一系列礼物，被母亲当作荣宠。有时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这样一块园地鼓舞和鼓励，坚持创作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个人在漫长的征途中，太需要这样的园地相陪伴了。有一段时间，《天津日报》明显涨了稿费，一位老领导约我采访了因为经济纠纷入狱的人。我的那些读者，遇到好的故事总想着提供给我，现在也这样，好像我就是个收集故事的人。这位主人公在狱中受了许多磨难，从开始被欺负，到成了里边的“山大王”，很多故事能让人笑出眼泪。她出狱后处境艰难，我把她的经历写成了小说，收到稿费后，分了一半给她。

我还结识了各种各样的读者。有个初中生，在丝瓜架下读小说，而后给我写了封长长的信放进了邮箱。我至今都还记得我读信时泪蒙双眼。有个老大姐是知青，年轻时有很多未了心愿，看了小说后找到我，提供了很多素材。可惜我对那些故事缺乏把握，一直也没写出来，时过境迁，还总是能想起。母亲住在老家，经常接待各种各样的读者。有个小姑娘从静海跑来了，就为看看我长大的村庄什么样。还有个双腿瘫痪的残疾人，租了一辆大发车来我家，我母亲烙大饼给她吃。一次发表了小说《折腰》，与母女之间因为新旧钱币而发生误会的故事，一个读者在图书馆看到了，把报纸拿出来复印。因为纸张太大，他就那样迎风拿在手里，也不舍得对折。姐姐在学校当老师，看到我时就说，我给你找张报纸吧。前几天他对我说，拿到了报纸后，复印件也没得丢弃，直到现在都还保存着。还有一对年轻的教师夫妻，前段时间还谈，方言“那角和”别的地方没有。“定三鞭子抽五鞭子这样的细节，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小说是写父母双亡的一对小兄弟，彼此相依为命。“那角和”是一个的头号。哥哥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想取而代之当车把式，约定三鞭子抽五鞭子。弟弟心疼我也心疼。但时过境迁，别人不提我早忘了。

县里有几位老领导，都是我的小说迷。他们能看到的小说都是发表在报纸上。就是现在，看到以后也会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也谈感想体会。他们都望九十高龄了，不上网，没有手

机微信，阅读习惯还是年轻时养成的。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休息了。有位老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我在小说里把时间弄错了。现在是20世纪，上个世纪是19世纪。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在床上陡然坐起身，第一时间回忆俄罗斯19世纪文学巨匠，普希金、托尔斯泰、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断定我辈没有那个幸运，跟他们共享一片天空，才镇定下来。人难免犯迷糊，小有小的迷糊，老有老的迷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老领导爽朗地笑着说。

林林总总的记忆，都在大脑深处蛰伏，没有合适的时机，它们永远也难得见天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从孙犁先生创刊时起，扶持新人就是传统。举办擂台赛，办创作学习班，推各区县业余作者的稿件，很多作者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成为各区县的创作骨干。2018年，我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宋曙光老师在“文艺周刊”特辟文学评论专版，进行宣传推介，每一个创意都需要编辑付出大量辛勤的劳作，我也跟编辑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亦师亦友，在创作上得到过很多帮助。我懈怠的时候，孙秀华老师写长信鼓励：“你得到各方面的承认不容易，自己要珍惜啊！”这是大约2000年左右的事，我回忆了一下，不是自己懈怠，是

文艺周刊

第三〇〇〇期 纪念专版

有时候容易得过且过。随便发点什么文字，都觉得很成绩，没有更高更远的眼界和追求，说穿了，就是自欺欺人。宋曙光老师曾多次来蓟州，跟我面对面交谈。犹记得陪他去连翘谷看连翘，漫山遍野的山花金黄灿烂，点亮了那一片天空。我领过奖状的照片，就取材于那一天黄澄澄的风景，在心里明拖了很多时日。

这3000期的内容，有我参与多少呢？微不足道。就是这些微不足道文字，鼓舞我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了今天。这块文学园地就像一条河流，作者都是它的水滴。祝福越来越多的水滴汇入这条河流，让它成为汪洋大海。

致敬“文艺周刊”！

我有幸参与《天津工人文学史》的编辑工作，五十余万字的文学史可谓厚重，意味可深。难能可贵的是，这部文学史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文学的辉煌，从“近代中国看天津”这一角度，我在这部文学史中，看到了新中国看天津的深远影响。

新中国之初，一直被压迫受剥削的工人翻身做主人，他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忱，投身到国家建设的宏伟事业。天津，百废待兴，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为一支富有强大力量、激情高涨的建设大军，劳动让整个城市沸腾了。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像时代的音符，铿锵有力。工人呼喊“加油干”的调子此起彼伏，犹如《翻身农奴把歌唱》中的歌词：“叫我怎能不歌唱……”面对火热的生产和生活，工人们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抒发从心底升起喜悦之情，他们热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岗位。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孙犁作为《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创办者之一，他以职业的高度敏感和预判，面对天津城市工厂众多、工人数量庞大的情况，需要组织一支工人文艺队伍，让党报响应潮流，发挥战斗性和现实功用，宣传刚刚解放的新天津，宣传新形势下的社会现实和火热的生活。《天津日报》创刊次日，孙犁便在副刊发表了极具导向意义的文章《谈工人文艺》：“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并在工厂、作坊，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我们就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工厂和作坊，也要初步建立自己的文艺工作。”3月24日，《天津日报》创办了纯工人副刊“文艺周刊”，重点培养与扶植文学新人，孙犁本人则深入生活，亲自下工厂，创作来自生活的文艺作品，示范、引领工人作家和工人作家如何创作。

带着墨香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刚一创刊，就像磁铁一样，吸引来城市各大工厂的工人作者的稿件。这些稿件带着作者的体温，带着激动不已的呼吸，带着质朴热烈的感情，无比的鲜活。但更多的稿件是稚嫩的、不成熟的，诗歌像口号和顺口溜，散文、小说还达不到文学作品的要求，然而副刊又需要来自基层、来自生活的作品，需要工人写、写工人。孙犁站在时代的潮流，与工人有着同样的感受与情怀，他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感动着工人们的感动，感动着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劳动与奉献。我在《天津工人文学史》中，在阅读记录孙犁对工人作者的支持和培养时，最突出的感受是，没有孙犁就没有天津工人作家、工人文学，孙犁以心血，以深情投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片沃土，培植出天津工人作家、工人作家的百花园。

来自工人队伍中的工人作者，尤其在早期，大多为小学文化，有的是童工出身，没有读过书，但他们爱学习、爱写作，成为所在单位的报社通讯员。工人作家董迺相在他的文章《枯树新生忆深情》中写道：“《天津日报》创刊，当时我是22岁的铁路工人。我们几个工人读着报纸像喝着她的乳汁，贪婪地吮吸着她

我在199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当时36岁。此前一年，肖克凡老师对我说：“兄弟，你整天弄历史玩，也不干点嘛，日后吃饭呐！”我问该怎么办？他说：“你玩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放到小说里，还是写小说吧。”我明白他的潜台词是：“你要是想升官发财坐汽车，哥哥没办法，但你要是写小说，哥哥还能帮把手。”于是我便开始学习写小说，与期刊编辑建立联系的事，主要由肖克凡老师推介。第二年发表两篇小说之后，我问肖克凡老师：“我写到什么程度，才能从‘业余作者’变成‘作家’？”我深知自己这话问得冒失，我从1986年进入天津市作家协会工作，见过数百位“业余作者”，却为数有限，深知完成这个蜕变比升官发财还要难些。肖克凡老师没有怪我冒失，只是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如果今天有青年作家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必定会“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

以下为肖克凡老师的回答：“什么时候变成‘作家’，自己说了不算，但是你在天津写作，有两个指标可以参考，一个是等待《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主动向你约稿，另外一个是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转载你的小说。”

这“两个等待”乃肖克凡老师对我的因材施教，我记得在心里，慢慢写我的天津故事，借用老前辈杜甫先生的话说，算是“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学习写作之初的无知无畏倒也变成有作。转眼间

七年过去，到了2004年秋天，纪念天津建卫600周年。忽一日，我接到《天津日报》文艺部宋曙光老师的电话，约我给“文艺周刊”写一个天津题材的短篇小说，于是，我的“第一个等待”实现了，这一年我43岁。自此之后，宋曙光老师便成为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责任编辑，直到他退休。

“第一个等待”的实现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此前几年我一直在写中篇小说，这是一种文本要求纳短篇小说的文体，写作者在技术上和审美上不甚严重的缺陷，发生在三四万字的文本中，有可能会被写作者隐藏或是被读者宽容。然而，报纸文艺副刊只能容纳短篇小说，我自揣，排版后的文字字数不能超过七千字，怎么办？于是，我在给这篇小说创建文本时，第一行和第二行居中写上篇名与本人的笔名，第三行顶格写上“全文五千字”，第四行开始才是正文。方才我找出这篇小说的原始文本查看，篇名叫《在传说中等待》，全文4529字。

《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这篇约稿，是我个人写作上的一个分水岭，虽然我从开始学习小说创作的时候，便一

边学习写作，一边学习小说技巧，但并不想错过孙犁对作品的讲解与评价，充分感受副刊编辑对工人文学的格外重视，会场极为安静。孙犁在对古冶车辆段工人郑国藩的小说《囤积》分析时说：作者要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自己投入到里面，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过，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对纸厂刘西午的小说《破布》评价说：应该从深刻方面努力，因为这才是故事的重点；线条必须鲜明，而且应该越来越显著，如血液循环，一到心脏，就必须鼓动起来才好。如果只是线条很长，而且时有中断，一接触中心，反似力不从心的弱点。对仁立毛呢厂职工陈慧翰的《生产委员》和《觉悟》点评：对话多于描写，而对话又多是口号，缺少内容，并且东一句、西一句缺少联系，这就需要不只注重刻画主角，也注意刻画身边的群众和生产的过程。

像这样对作品的分析，可谓苦口婆心，爱惜之情，扶助之情，浸透在谆谆教诲的言语与希望之中。即使是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依然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刘大光，在《孙犁与〈津门小集〉》的文章中说：为了赶在上班前到厂门口去采访工人进厂的实景，天不亮就起床赶往工厂。他为写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工人，为了让工人作者写好工人，可谓费尽苦心。他将写好工人的热情投入到发展工人文学、培养工人作者、创作工厂文艺的实践中去。

孙犁对《天津日报》副刊走出的工人作家极为关心。他的《阿凤散文集序》写得饱含深情，是真诚、客观的，可见君子之交。这篇序读来令人感动与感慨：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洋溢的，但在文章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负责、持之以恒的。

孙犁对持中的万国儒也是极为关心、爱护。1990年2月4日，他寄出明信片，真诚概念：“国儒同志：收到来信，知你病情好转，甚慰。我十分惦念你，前托老杨代为问候，不知他去了没有。望你安心养病，什么也不要想。世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也会有，什么样的事也会发生。不要去管它。祝好！”这张由家属提供的明信片是首次披露，十分珍贵。

万国儒去世后，孙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悼万国儒》，对万国儒的创作成绩、创作思想、作家素质等方面都给予评价，表达了珍惜与遗憾之情，对万国儒的关爱和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孙犁倾情天津工人作者的培养和扶植，耕犁《天津日报》副刊园地，以文学滋养作者心灵，以文学灌注作者创作价值观，陪伴着、盼望着他们成长、成熟，走向更大的舞台。他关心工人作家，爱得深沉，爱得持久。

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应该用文学去记录、去表现。曾经，孙犁以积极引导和组织天津工人文学发展为使命，一犁耕出百花园，照耀了一座城。如今，我们更应在振兴天津工业文化、工人文学方面，创作出属于时代的崭新篇章，让更多文学的精品力作，装点《天津日报》副刊的“百花园”，无愧于孙犁对天津工人文学的希望与祈愿。

题为孙犁寄给万国儒的明信片

第三个等待

龙一



在学习小说写作之前，《天津日报》文艺部的老师们几乎全都认识，《小说月报》的编辑老师们也几乎全都相识，然而，在我最初学习写作的七年里，他们既没有向我约稿，也没有转载我的作品，而是在观察我，仿佛在“等待”我的进化与蜕变。这种情形我在当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事后多年却是回味无穷的感激，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报纸和刊物当作“洁净的珍宝”来爱护，同时他们也深知拔苗助长，只会毁掉一个有前途的写作者。这份编辑对写作者的等待，是一种极为高级的“人情世故”，也是对写作者的赏识与信心，这算是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三个等待”吧。

今年是孙犁先生参与创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七十五周年、3000期纪念，又承蒙约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约稿，便写下来向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们致敬。

都不想错过孙犁对作品的讲解与评价，充分感受副刊编辑对工人文学的格外重视，会场极为安静。孙犁在对古冶车辆段工人郑国藩的小说《囤积》分析时说：作者要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自己投入到里面，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过，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对纸厂刘西午的小说《破布》评价说：应该从深刻方面努力，因为这才是故事的重点；线条必须鲜明，而且应该越来越显著，如血液循环，一到心脏，就必须鼓动起来才好。如果只是线条很长，而且时有中断，一接触中心，反似力不从心的弱点。对仁立毛呢厂职工陈慧翰的《生产委员》和《觉悟》点评：对话多于描写，而对话又多是口号，缺少内容，并且东一句、西一句缺少联系，这就需要不只注重刻画主角，也注意刻画身边的群众和生产的过程。

像这样对作品的分析，可谓苦口婆心，爱惜之情，扶助之情，浸透在谆谆教诲的言语与希望之中。即使是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依然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刘大光，在《孙犁与〈津门小集〉》的文章中说：为了赶在上班前到厂门口去采访工人进厂的实景，天不亮就起床赶往工厂。他为写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工人，为了让工人作者写好工人，可谓费尽苦心。他将写好工人的热情投入到发展工人文学、培养工人作者、创作工厂文艺的实践中去。

孙犁对《天津日报》副刊走出的工人作家极为关心。他的《阿凤散文集序》写得饱含深情，是真诚、客观的，可见君子之交。这篇序读来令人感动与感慨：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洋溢的，但在文章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负责、持之以恒的。

孙犁对持中的万国儒也是极为关心、爱护。1990年2月4日，他寄出明信片，真诚概念：“国儒同志：收到来信，知你病情好转，甚慰。我十分惦念你，前托老杨代为问候，不知他去了没有。望你安心养病，什么也不要想。世界这么大，什么样的人也会有，什么样的事也会发生。不要去管它。祝好！”这张由家属提供的明信片是首次披露，十分珍贵。

万国儒去世后，孙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悼万国儒》，对万国儒的创作成绩、创作思想、作家素质等方面都给予评价，表达了珍惜与遗憾之情，对万国儒的关爱和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孙犁倾情天津工人作者的培养和扶植，耕犁《天津日报》副刊园地，以文学滋养作者心灵，以文学灌注作者创作价值观，陪伴着、盼望着他们成长、成熟，走向更大的舞台。他关心工人作家，爱得深沉，爱得持久。

新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应该用文学去记录、去表现。曾经，孙犁以积极引导和组织天津工人文学发展为使命，一犁耕出百花园，照耀了一座城。如今，我们更应在振兴天津工业文化、工人文学方面，创作出属于时代的崭新篇章，让更多文学的精品力作，装点《天津日报》副刊的“百花园”，无愧于孙犁对天津工人文学的希望与祈愿。

题为孙犁寄给万国儒的明信片